

## ※ 學林誌傳 ※

# 顧頡剛與錢穆學術交遊考

劉書惠、楊 棟\*

顧頡剛與錢穆是二十世紀中國兩位極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。追溯二人交往過程，學人多依憑錢穆之《師友雜憶》，但此書實為「憂患迭經，體況日衰，記憶銳退」的耄耋老人對往昔的回憶<sup>1</sup>，論及諸事時不免有所遺漏和偏差。近年《顧頡剛日記》（臺灣）、《顧頡剛全集》、《錢穆先生學術年譜》相繼出版，則為此方面研究提供了更為豐富切實的資料。通過對相關資料的梳理和分析，可以看出兩位大師的交往主要經歷了五個階段：第一階段，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，故鄉初識，顧頡剛激賞錢氏學術，錢穆久聞顧氏盛名，惺惺相惜之情，竭力提攜之心，拉開了二人學術交誼的帷幕；第二階段，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七年，聚首北平，共同執教高校，初入學界中心的錢穆與叱吒學壇的顧頡剛不但結下了深厚的友情，更成為彼此的學術知音；第三階段，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，重聚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，顧頡剛與錢穆無論在生活中，還是在學術研究中，關係都更為密切；第四階段，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，國學研究所職權交接的誤會，對時局與人事的不同態度和看法，致使二人分歧漸生，關係轉冷，自顧頡剛離開齊魯大學後，他們再無共事機緣；第五階段，一九四九年以後，天各一方，受思想性格及政治環境影響，顧頡剛與錢穆走向了兩條不同的人生道路，但仍不忘情彼此。

## 一、故鄉初識，提攜砥礪

江蘇這片蘊含古典氣韻、充滿人文生機的土地，曾哺育了無數文人墨客、學者

---

\* 劉書惠，哈爾濱黑龍江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講師。楊 棟，哈爾濱黑龍江大學文學院副教授。

<sup>1</sup> 錢穆：《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5年），頁43。

名家，而生於斯長於斯的顧頡剛與錢穆無疑是頗具代表性的兩位。一位師承大家少年得志，不過而立即以「古史辨」派開一代學術新風；一位中學肄業教書為生，勤勉不息求索學海，以厚積之力待薄發之時。二者既遇，惺惺相惜，迸發出了閃耀史界的火花。

顧頡剛與錢穆何時初識，沒有明確的資料記載，我們推測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，即顧頡剛至蘇州中學演說之時。當時正在蘇州中學執教的錢穆已讀過《古史辨》，「余在三師時，……其時顧頡剛《古史辨》方問世，余手一冊，在湖上，與之勉暢論之」<sup>2</sup>。其於顧氏大名早有耳聞，似應有面見之心。加之顧氏的演講題目為「對於蘇州男女中學的史學同志的幾個希望」，對象既為「史學同志」，醉心史學的錢穆更不會錯失聆聽良機。事隔八日，顧頡剛在日記中寫道：「今晚同席：錢賓四、陳旭輪、沈勤廬、陳其可、王以中（以上主），予（客）。」<sup>3</sup>錢穆能作為邀宴之主，看來二人已是相識。因此，此次演講極可能是顧頡剛與錢穆的初次見面。但顧頡剛此行匆匆，與錢穆交流甚少，印象不深，而錢穆更是在回首往昔時，徑將三個月後顧氏登門拜訪當作二人的初遇<sup>4</sup>。

一九二九年六月底，顧頡剛從燕京大學返蘇，為父做甲子壽。顧、錢二人的學術交誼即於顧頡剛留蘇的兩月間正式展開。此前的十餘年間，錢穆一直於諸子考論用力不輟，寫出了《國學概論》、《墨子》、《王守仁》等學術論著，但空谷幽蘭，尚沒有得到學界的足夠關注。顧頡剛的出現無疑改變了錢穆及其心血結晶《先秦諸子繫年》的命運。一九二九年七月，東吳大學陳天一偕顧頡剛造訪錢穆。顧頡剛見《先秦諸子繫年》手稿，求攜返家中細讀。隔數日，顧頡剛將行，陳天一又偕錢穆回訪，顧頡剛云：「君之《繫年》稿僅匆匆翻閱，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，宜去大學中教歷史。」<sup>5</sup>顧頡剛傾賞錢穆深厚的考據功力及獨立的史學思想，坦誠地為錢穆指出了一條更廣闊的發展道路，並積極向中山大學推薦<sup>6</sup>。因蘇中校長汪懋祖的

<sup>2</sup> 同前註，頁 123。錢穆曾於 1923-1927 年間在三師（江蘇省無錫第三師範學校）任教。

<sup>3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7 年），第 2 卷，頁 275，「1929 年 4 月 23 日」；另可參見顧潮：《顧頡剛年譜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3 年），頁 173。

<sup>4</sup> 錢穆：《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》，頁 141。

<sup>5</sup> 同前註，頁 148。

<sup>6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 2 卷，頁 305，「1929 年 7 月 22 日」；錢穆：《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》，頁 141。

極力挽留，錢穆婉辭中大，仍留蘇中。顧頡剛對此頗感惋惜，遂「到三元坊，訪汪校長，商請賓四到粵事」<sup>7</sup>。此番愛才薦才之舉，可堪學界佳話。

錢穆赴粵一事未成，顧頡剛一方面轉而向燕大竭力推薦，另一方面又屢邀錢穆為《燕京學報》撰文<sup>8</sup>。錢穆此時讀康有為《新學偽經考》，心有所疑，「又因頡剛方主講康有為，乃特草〈劉向歆父子年譜〉一文與之」<sup>9</sup>。此文辨康說之非，指出《新學偽經考》言劉歆造偽有二十八處不通，不啻與顧爭議。顧頡剛認為此文「尋出許多替新代學術開先路的漢代材料」<sup>10</sup>，用近三個月的時間數次閱讀校對，詳做筆記，這在《顧頡剛日記》中有很明確的記錄：

1930年3月13日，看錢賓四〈劉向歆父子年譜〉一文，太長，未畢。寫筆記數頁。

1930年3月14日，看〈劉向歆父子年譜〉，仍未畢。

1930年4月23日，校〈劉向歆父子年譜〉三十頁。

1930年4月28日，看〈劉向歆父子年譜〉一遍，畢。

1930年5月12日，校《古今偽書考》序及《燕京學報·向歆年譜》。

1930年5月13日，校《燕京學報》（〈向歆年譜〉）。

1930年5月25日，校《燕京學報》三十頁，〈劉向歆年譜〉一文畢。<sup>11</sup>

此番勞心勞力，謹慎細微，是自顧氏負責刊物以來未曾有過的<sup>12</sup>。文章最終發表於《燕京學報》第七期（後又刊登於《古史辨》第五冊）。〈劉向歆父子年譜〉一文的發表，震盪了風靡一時的今文經學學界，引起了北平學界熱議，也拉開了二人學術交遊的帷幕，不但讓顧頡剛認識了錢氏對今古文的態度，聽到了新的聲音，更讓錢穆真切地感受到了顧氏的開闊胸襟，「此種胸懷，尤為余特所欣賞。固非專為余私

<sup>7</sup> 同前註，第2卷，頁310，「1929年8月6日」。

<sup>8</sup> 錢穆：《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》，頁141。

<sup>9</sup> 同前註，頁145。

<sup>10</sup> 顧頡剛：〈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〉，《古史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），第5冊，頁483。

<sup>11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2卷，頁384，「1930年3月13日」、「1930年3月14日」；頁395，「1930年4月23日」；頁396，「1930年4月28日」；頁400，「1930年5月12日」；頁401，「1930年5月13日」；頁404，「1930年5月25日」。

<sup>12</sup> 錢穆的這篇手稿，顧頡剛一直收藏著，具體校改內容可參看顧洪：〈記顧頡剛先生收藏錢穆先生的一份手稿〉，《清華漢學研究》第2輯（北京：清華大學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頁246-248。

人之感知遇而已」<sup>13</sup>。

## 二、北平聚首，學術知音

一九三〇年六月，顧頡剛「得賓四電，決就燕大」<sup>14</sup>。是年九月，錢穆出任燕大國文系講師。這是錢穆第一次走上大學講壇，為其「生活上一大變」<sup>15</sup>，意義不言而喻。錢穆初至燕大，顧頡剛撥冗抽身為之接洽，陪其同謁校長吳雷川，又同去郭紹虞家<sup>16</sup>。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二日，顧頡剛又引錢穆面見胡適，言：「君與適之相識，此來已逾半年，聞尚未謀面。今星期日，盼能同進城一與相晤。」<sup>17</sup>《顧頡剛日記》亦云：「與紹虞、賓四同進城，到景山書社，候履安來，同到適之先生處，並晤志摩。」<sup>18</sup>三人相聚，盡談老子問題。顧頡剛又愛才心切屢次索稿，錢穆所撰〈周官著作時代考〉、〈周初地理考〉、〈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〉、〈評顧頡剛《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》〉諸文均刊載於《燕京學報》。顧氏還熱心介紹錢穆《先秦諸子繫年》列入「清華叢書」，特持原稿推薦。雖然審查未獲通過，亦足見提攜之意。

始入大學任教，錢穆對教會學校的環境不太習慣，又因性格倔強，使得二三瑣事往往成為大問題。不滿一年，錢穆就不願再執教燕大，向顧氏表達了辭離之意。因比較了解錢穆的心思和處境，此次顧頡剛既沒問原因，也沒挽留，而是又向北京大學推薦了錢穆。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八日，在寫與胡適的推薦信中，顧頡剛說：

聞孟真有意請錢賓四先生入北大，想出先生吹噓。我已問過賓四，他也願意。我想，他如到北大，則我即可不來，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，且他為學比我篤實，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，但我尊重他，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。故北大如請他，則較請我為好，以我有流弊而他無流弊也。他所作《諸子繫年》，已完稿，洋洋三十萬言，實近年一大著作，過數日當請他

<sup>13</sup> 錢穆：《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》，頁 145。

<sup>14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 2 卷，頁 413，「1930 年 6 月 26 日」。

<sup>15</sup> 錢穆：《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》，頁 144。

<sup>16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 2 卷，頁 435，「1930 年 9 月 3 日」；頁 466，「1930 年 12 月 8 日」。

<sup>17</sup> 錢穆：《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》，頁 151。

<sup>18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 2 卷，頁 509，「1931 年 3 月 22 日」。

奉覽。<sup>19</sup>

發自內心的激賞，使顧氏之薦不遺餘力。錢穆也回憶說：「一九三一年夏，余在蘇州，得北京大學寄來聘書。待余赴平後，清華又來請兼課。此必頡剛在北平先與兩方接洽，故一專任，一兼課，雙方已先洽定也。」<sup>20</sup>又因錢穆以治先秦諸子聞名，頗合當時北大史學研究偏重先秦的趨勢，於是謀得此職。

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，錢穆一直在北大授課，顧頡剛也長期待在北平，或於同校共事，或就學術爭鳴，二人交往未曾中斷。在學術研究中他們是同仁，彼此激勵和學習。一九三四年二月，顧頡剛授「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」課，以學生課作為基礎，創辦《禹貢》半月刊，內容專門討論古代地理，至「七七事變」時此刊共出七卷八十一期，形成了「禹貢學派」。在《禹貢》組稿發行的過程中，顧頡剛經常與錢穆書信商討、邀稿<sup>21</sup>，視其與譚其驤為辦刊的左膀右臂<sup>22</sup>。「史學研究會」的會議，「讀書週刊社」的宴席，《史學月刊》的籌備……此階段的學術活動中，總能看到二人相攜而坐，認真探討的身影<sup>23</sup>。在生活上他們又是摯友，互相關照：經濟困難時，借錢資助；無處安身時，空宅以待；生病難耐時，登門探視；難以成行時，為之請命<sup>24</sup>。

### 三、共事齊魯，交誼日深

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，顧頡剛作為學術領軍人物，因曾組織文化界人士發表抗日宣言，而被列入日寇圍捕名單。在離開北平前，他將《禹貢》期刊交給錢穆，「請負《禹貢》編輯名義」<sup>25</sup>。不久，北平危急，北大、清華、南開三所大學為

<sup>19</sup> 轉引自顧潮：《歷劫終教志不灰——我的父親顧頡剛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頁142。

<sup>20</sup> 錢穆：《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》，頁146。

<sup>21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3卷，頁316，「1935年3月7日」。

<sup>22</sup> 同前註，頁333，「1935年4月12日」。

<sup>23</sup> 同前註，第2卷，頁564，「1931年9月18日」。第3卷，頁349，「1935年5月31日」；頁397，「1935年10月6日」；頁573，「1936年12月20日」。

<sup>24</sup> 同前註，第3卷，頁82，「1933年8月27日」；頁97，「1933年10月11日」；頁365，「1935年7月10日」；頁379，「1935年8月15日」；頁340，「1935年5月8日」。

<sup>25</sup> 同前註，第3卷，頁666，「1937年7月17日」。

躲避戰火遷至昆明，組為西南聯大，錢穆亦跟隨學校南下。在西部進行過一段時間考察後的顧頡剛，則於一九三八年十月抵達昆明，任雲南大學教授。再次聚首，二人往來依舊頻繁<sup>26</sup>。

一九三九年九月，顧頡剛至成都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。該所乃於十年前成立，因戰事中斷，顧頡剛此次重建，擬就各種章程及經費預算，並負責延攬人才<sup>27</sup>。此時他再次想到了錢穆，並致信校長劉書銘竭力推薦，獲立允。錢穆應顧氏之邀，但為攜其《國史大綱》稿赴香港商務印書館談付印之事並返蘇探母，議定秋後入蜀。後錢穆意欲侍奉老母，遂通函顧頡剛請假一年，顧復函允假，薪水照發，且囑託錢穆主編《齊魯學報》。這段時間二人關係並未因遙隔兩地而有所疏遠：錢穆返蘇時沿途照料歸鄉處理家事的顧氏家眷殷履安；一番「兄如房玄齡，弟則如杜如晦」的「老友之言」又讓顧頡剛從中獲得極大的精神力量<sup>28</sup>，將其視為進退齊一的戰友，「看能把我打倒否？並能打倒賓四與誠之否」<sup>29</sup>？

錢穆有回北大之心，因而齊魯大學「劉校長到滬，賓四不肯往見」<sup>30</sup>。顧頡剛遂於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八日致信錢穆：「去冬聞昆明來人言兄下年仍回北大，當時以為傳者之訛。今觀兄書，雖僅寥寥數行，亦可作大體之推測，乃知所聞者為真也。」<sup>31</sup> 信中以研學氛圍、兩人情誼和生活條件三者為由，請勸錢穆入蜀。於是歲夏錢穆離家入川，輾轉至成都履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教職，兼授齊魯大學課。

如同錢氏首赴燕大一樣，顧頡剛又為其打點一切：從進城接機到預定臥室，從偕訪校長到導遊校園，從設宴款待到開會相迎，無處不細微，無處不周到<sup>32</sup>。錢穆入城未回，顧氏更是極為擔心，於日記中徑問：「今日賓四不歸，其在城病乎？」

<sup>26</sup> 同前註，第4卷，頁172，「1938年12月11日」、「1938年12月14日」；頁174，「1938年12月20日」、「1938年12月21日」；頁179，「1938年12月31日」；頁193，「1939年1月27日」；頁198，「1939年2月10日」；頁205，「1939年3月3日」；頁214，「1939年3月30日」；頁215，「1939年3月31日」。

<sup>27</sup> 顧潮：《顧頡剛年譜》，頁295。

<sup>28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4卷，頁395，「1940年6月30日」。

<sup>29</sup> 同前註，頁397，「1940年7月3日」。

<sup>30</sup> 同前註，頁348，「1940年2月24日」。

<sup>31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書信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），第3卷，頁130-131。

<sup>32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4卷，頁440，「1940年10月20日」；頁441，「1940年10月22日」；頁444，「1940年10月30日」。

並於第二日「代賓四值日」<sup>33</sup>，關切之情溢於言表。在這段時間裏，朝夕相處令二人在情感上更加親近：大年夜同桌吃飯，講笑話唱戲；意興頓起時一同相面；滿懷情致時談天賞月；錢穆喪母，顧頡剛「即欲告之，眾人勸暫緩。然看賓四精神不寧之狀，覺得不如使其解決此問題為善，故徑告之，任其一哭」<sup>34</sup>。語者心懷不忍，聞者縱情一哭，二者之情有別於他人，由此可見矣。

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不但是他們同事共處的地方，也是他們共同追求學術理想的平臺。顧頡剛極其重視研究所的發展規劃，並期望研究所的相關工作於學術研究、古籍整理有所裨益，故與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先生積極商談，「渠深以標點二十四史一事為善，謂渠亦有志於此而未為者，囑我輩趕速將此事作成，由商務以一年之力印出」<sup>35</sup>。得知此消息後，顧頡剛立即在當日日記中草列各部史書的標點者名單，錢穆與其一同負責《史記》<sup>36</sup>。錢穆公出得悉有助延攬人才、益於研究所發展之消息時，亦盡快報知顧氏<sup>37</sup>。二人於所中事業均盡心竭力。後因顧頡剛在研究所內的權力受到限制掣肘，終生離去之意。一九四一年六月，顧氏抵重慶，任文史雜誌社副社長，並至中央大學兼課。

#### 四、矛盾初生，關係轉冷

顧頡剛赴渝後，錢穆曾勸其回校，但顧氏心為形役，自此二人再也沒有在教學崗位共事過<sup>38</sup>。世事變遷，紅塵過往，二人矛盾漸生，關係轉冷，究其原因，大致有三<sup>39</sup>：

其一，錢穆鋒芒畢露，使顧頡剛失去提攜者的心理優越感。方詩銘回憶說：「班中同學甚眾，多有來自外校者。賓四先生善言辭，長於演講，而顧頡剛先生則

<sup>33</sup> 同前註，頁 447，「1940 年 11 月 7 日」。

<sup>34</sup> 同前註，頁 477，「1941 年 1 月 26 日」；頁 490，「1941 年 2 月 12 日」；頁 491，「1941 年 2 月 14 日」；頁 566，「1941 年 8 月 6 日」。

<sup>35</sup> 同前註，頁 503，「1941 年 3 月 14 日」。

<sup>36</sup> 同前註，頁 512，「1941 年 3 月 31 日」。

<sup>37</sup> 同前註，頁 588，「1941 年 10 月 1 日」。

<sup>38</sup> 同前註，頁 649，「1942 年 3 月 4 日」。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書信集》，第 3 卷，頁 131。韓復智：《錢穆先生學術年譜》（北京：中央編譯出版社，2012 年），第 3 卷，頁 800。

<sup>39</sup> 鄭善慶：〈房謀杜斷——論錢穆與顧頡剛的分野〉，《書屋》，2010 年第 8 期，頁 29-32。

反是，上課時多寫黑板，略加解釋而已。」<sup>40</sup> 胡厚宣〈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回憶點滴〉又說：「顧先生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只有兩年時間，錢先生一來受不了。錢先生來齊魯，顧先生本應高興，但錢先生又會講又會說，學生非常擁護，顧先生名義上受不了。」<sup>41</sup> 從中可以體味到，學識深厚而言語表達不甚流利的顧頡剛，對侃侃而談的錢穆應是有些豔羨的。但這還不是導致兩人關係微妙的主要原因，畢竟顧頡剛深知錢穆能力，如果顧頡剛忌才善妒，也不會有力薦錢穆代其齊大之職的眼光和器量。因此，即便顧頡剛心有失落，生瑜亮之思，也無傷大雅。

其二，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之職的轉任矛盾。顧頡剛一九四一年六月至重慶前，就打算把研究所主任一職轉交錢穆，日記「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」載：「當使此一機關漸變為賓四所有，予則漸漸退出也。」<sup>42</sup> 日記「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」又載：「予三十年到渝，所務由賓四代，……三十一年，履安來渝，勸辭職，予聽之，賓四正式接任。」<sup>43</sup> 錢穆《師友雜憶》亦言：「顧頡剛終以久滯重慶不歸，乃正式提出辭去研究所職務，由余接替。」<sup>44</sup> 而胡厚宣〈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回憶點滴〉則云：「顧先生始終未辭所長主任職，始終未交權給錢穆。錢先生《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》說交錢穆，事實未交，顧、錢兩先生講的都不對。」<sup>45</sup> 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顧頡剛給錢穆的信中又說：「然研究所者（齊大國學研究所），弟費了兩年心力所建設者也，自身雖去，終不忍其倒塌。去年走時，所以仍擔任主任名義者，即恐因弟一走而致人心渙散，故欲以請假延長時間，使兄之力量可漸深入，則至弟正式辭職時可無解體之憂也。」<sup>46</sup> 顧氏考慮平穩交接，而使轉職一事拖延良久。而未等職權完全正式轉交，錢穆就已離開齊大轉赴華西大學任教。《顧頡剛日記》中也有兩處記載反映了顧頡剛未交職：

1942年9月25日，書銘謂賓四對我有誤會，我想，我是竭誠要賓四作研究

<sup>40</sup> 方詩銘：〈錢賓四先生散憶〉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無錫縣委員會編：《錢穆紀念文集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37。

<sup>41</sup> 胡厚宣：〈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回憶點滴〉，《中國文化》第14期（1996年12月），頁227。

<sup>42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4卷，頁530，「1941年5月8日」。

<sup>43</sup> 同前註，第5卷，頁457，「1945年4月30日」。

<sup>44</sup> 錢穆：《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》，頁231。

<sup>45</sup> 胡厚宣：〈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回憶點滴〉，頁227。

<sup>46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書信集》，第3卷，頁132。



所主任者，若賓四真對我誤會，則賓四為不智矣。

1942年10月4日，前日書銘來，謂我寫與彼信，有「只要錢先生任主任，將來剛幸能擺脫塵世，必仍有為齊大專任研究員之一日」等語，使賓四對得起誤會。今日丁山來，又謂在三臺時，文通適來，談及錢先生對我有不滿意處，而文通謂是賓四對。丁山又云，楊拱辰得崇義橋信，謂錢先生對我不高興，不欲我回去。三人成市虎，得非賓四對我確有不滿意處乎？<sup>47</sup>

由此可知，顧頡剛所長一職確實沒有正式交予錢穆，錢穆誤會顧頡剛貪權戀職，自己主持所務有實無名，心生芥蒂。胡厚宣言：「顧先生至渝做事，與朱家驊編《文史雜誌》，國學研究所主任所長職不交錢先生。錢先生非常不滿，同我抱怨道一不來又不交。」<sup>48</sup>而顧頡剛以前離開中山大學時就有類似的做法，讓商承祚擔任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代理所長，自己仍然兼任所長。雖然顧頡剛慮及所務繁雜，謹防人心散漫而沒有即刻轉職，但這種做法恰恰顯示出其不會圓滑處世的書生氣，引發誤解，生出嫌隙，在所難免。

其三，對時局與人事，二人有不同態度和看法。錢穆與顧頡剛具是傲骨錚錚、清氣溢襟的血性文人，不同的是，前者更為淡定從容，後者更顯縝密敏感，這令兩人在面對時局世事與人際往來時，常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和心理。

顧頡剛與張維華相識十幾載，最初素加愛護，至齊大之後顧頡剛頓覺其人「器小易盈，得意忘形，一方面即挾弟以自重，一方面又挾校長以迫弟，欲於短時期內自為曹操而強弟為漢獻帝，一不稱心，即流言四播，非令弟仰彼鼻息不止」<sup>49</sup>。認為「予太負責，致使西山無插足地，故渠必欲破壞之。渠對賓四，忠順萬狀，其目的則聯甲倒乙而已」<sup>50</sup>。顧頡剛又對張其昀向來「眼中出火」<sup>51</sup>。而錢穆和張其昀等人交往較密，與之同編《思想與時代》並在上面發表多篇文章<sup>52</sup>。顧頡剛不以為然、多有齟齬之人，錢穆卻能和睦共處，此番種種，不一而足。這令自認與錢穆親近的顧頡剛生出些許孤立和叛離之感，因之時發微詞：

<sup>47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4卷，頁739，「1942年9月25日」；頁743，「1942年10月4日」。

<sup>48</sup> 胡厚宣：〈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回憶點滴〉，頁227。

<sup>49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書信集》，第3卷，頁132。

<sup>50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4卷，頁485，「1941年1月31日」。

<sup>51</sup> 胡厚宣：〈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回憶點滴〉，頁226-227。

<sup>52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4卷，頁368，「1940年4月28日」。

張其昀有政治野心，依倚總裁及陳布雷之力，得三十萬金辦《思想與時代》刊物於貴陽，又壟斷《大公報》社論。賓四、賀麟、蔭麟等均為其羽翼。賓四屢在《大公報》發表議論文字，由此而來。其文甚美，其氣甚壯，而內容經不起分析。樹幟讀之，甚為賓四惜，謂其如此發表文字，自落其聲價也。<sup>53</sup>顧頡剛與錢穆同懷家國之憂，曾努力地在動盪年代中承擔起知識分子的責任。錢穆積極提倡軍事地理教育，並在一九三九年撰寫〈建國三路線〉一文，以「中國以往立國規模之大概」，「討論目前的建國問題」。顧頡剛聯合錢穆、錢玄同、姚從吾、孟森、徐炳昶等百餘人上書國民政府，促其早定抗日大計<sup>54</sup>。因「不忍民族之覆亡」，而參與政治活動，辦《禹貢》與通俗讀物<sup>55</sup>。但面對政治與時局，兩人的立場和觀念又有所不同。抗戰時期錢穆因〈中國革命與中國軍人〉、〈中國革命與中國青年〉等文為蔣介石聞知和賞識，當時其自身對政治也稍有興趣，希望能學以致用，所以與國民黨當局走得較近，不但被請去重慶復興關中央訓練團演講，還差一點做了教育部國立編譯館人文組長。顧頡剛則與國共兩黨均有交涉。他曾於一九三六年加入國民黨，為爭取通俗社和禹貢學會經費，而接觸國民黨中央黨部和教育部<sup>56</sup>，也曾承命作「九鼎銘辭」歌功頌德<sup>57</sup>，更參與過制憲和總統選舉活動<sup>58</sup>。另一方面，顧頡剛十分關注共產黨的抗戰作用及各種動態，並因辦通俗讀物事，而與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謝覺哉等人有過直接接觸，他說：「然民眾教育惟彼方能識之，亦惟彼方敢為之也。」<sup>59</sup>又在建國前直接給毛澤東寫信<sup>60</sup>。顧頡剛辦民眾讀物，希望喚起民眾，提出「正該因時局的安定格外擴展開來，使它成為建國的利器」<sup>61</sup>。而錢穆則認為，由民眾直接建立政府，往往是「反面消極的撲一個空」<sup>62</sup>。上述差異反映出

<sup>53</sup> 同前註，頁 602，「1941 年 11 月 10 日」。

<sup>54</sup> 汪學群：《錢穆學術思想評傳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1998 年），頁 11。

<sup>55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 3 卷，頁 518，「1936 年 8 月 16 日」。

<sup>56</sup> 同前註，第 11 卷，頁 60-61，「1968 年 12 月 31 日」。

<sup>57</sup> 同前註，第 5 卷，頁 18，「1943 年 1 月 28 日」。

<sup>58</sup> 同前註，頁 743，「1946 年 11 月 10 日」。第 6 卷，頁 270，「1948 年 4 月 8 日」；頁 273，「1948 年 4 月 14 日」。

<sup>59</sup> 同前註，第 3 卷，頁 748，「1937 年 12 月 15 日」。

<sup>60</sup> 同前註，第 6 卷，頁 512，「1949 年 9 月 3 日」。

<sup>61</sup> 顧頡剛：〈我們為什麼要辦民眾讀物〉，顧潮：《顧頡剛年譜》，頁 328。

<sup>62</sup> 錢穆：〈建國三路線〉，《文化與教育》（南寧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4 年），頁 74。

顧、錢二人不同的人生觀和政治觀，而這正是顧頡剛與錢穆日漸疏離的真正原因。

此後，關山路遙，互疏往來，顧頡剛又偶聞一些對錢穆的非議，更加影響了他的評價與判斷，這些也都記載在他的日記中：

1943年2月11日，與沈鏡如談，乃知賓四在齊大研究所排擠厚宣之狀。厚宣甲骨論文集，幾不能印。西大畢業生楊貽，欲研究考古及甲骨文，賓四乃謂欲入本所，須治秦漢史，彼益不願厚宣有一學生也。其吝如是，其前途可量矣。噫，賓四為人，貧賤可以不移，而富貴乃不能不淫，何好談修養者其自身無修養乃至是也！

1943年7月30日，洪禎告我，賓四在齊大種種驕吝之狀，使我長嘆。天下人氣量大者何其少也？器小而易盈者又何其多也？予雖無才，而有其量，自當為國家做些事矣。

1946年5月13日，以中言，賓四欲至雲南大學，蓋以與黃女私，不敢歸家，成都僻不如昆明，慮其夫人之追蹤以來也。……人心如此，變起床第，奈何奈何！

1948年6月1日，建猷云，日前唐君毅來滬，渠任江南大學教務長，謂賓四任文學院長，脾氣古怪，真有不可與同群之感。又謂當年顧先生不知如何與彼合作。按賓四為人，既驕且吝，又處處好占便宜，不為人留餘地。觀於其對共患難之夫妻尚如此薄情，何論友人乎！<sup>63</sup>

「賓四在齊大研究所排擠厚宣」之說於《顧頡剛日記》僅見此一處，其他與錢穆、胡厚宣共事研究所的同仁並未與顧頡剛言有此事。《顧頡剛日記》記「厚宣來談所事」<sup>64</sup>，亦沒有談到曾被打壓。胡厚宣本人在〈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回憶點滴〉中更無任何言辭指涉此事，卻云：「其間與錢先生談天，幾無所不談，非常爽快。於消夏亭、於村中小路，朝夕間，錢先生手牽我的小孩散步，口中以無錫話唱出自編童謠，一老一小的背影，帶來無窮回味。」<sup>65</sup>如此和諧的相處，如此美好的回憶，必不能為經歷打擊排擠諸事之人所有。沈鏡如並非錢、胡事件的當事人，其語顧氏詞必有傳聞與猜測的成分，或進而引起誤解。而所謂「種種驕吝之狀」不知所指

<sup>63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5卷，頁25，「1943年2月11日」；頁122，「1943年7月30日」；頁658，「1946年5月13日」。第6卷，頁292，「1948年6月1日」。

<sup>64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5卷，頁393，「1945年1月12日」。

<sup>65</sup> 胡厚宣：〈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回憶點滴〉，頁226。

為何？或許是學術研究上的傲骨和倔強，或許是授課講習建立起的氣派和聲威，抑或是開展所務時的決斷和堅持。魏洪禎敘述的內容與細節外人實難得知，不可妄言，但顧頡剛原就與錢穆生出嫌隙，難免往更壞處想去，而發出些批評和慨歎來。至於錢穆「與黃女私，不敢歸家」的緋聞，雖出自與錢穆淵源頗深的王庸之口，但一「蓋」字也說明了其猜測之意。《師友雜憶》載述：「舊隨齊魯研究生諸人皆散去，獨華西大學畢業一女學生黃淑蘭相伴。……淑蘭前在天津女師與余姨妹張一飛同學，極相善。……余來華西壩，遂來從學。余病惟彼乃一女生，常侍在側。」<sup>66</sup> 舊故從學，侍病照料，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，錢穆言辭坦然並無矯飾隱諱之意。況且一九四六年夏，他還由重慶飛抵南京，在由南京轉蘇州家中小住，如有私，斷不會有這樣的行事軌跡。錢穆於一九四六年秋前往昆明五華書院講學並兼雲南大學課務，實在是想在亂世中擇一安靜去處，謝絕人事讀書著述。錢穆學生、時任雲南大學教師的李埏也說：「賓四先生因素愛昆明氣候及景物，又感於方、于諸先生的誠意，遂同意南來，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初乘飛機抵昆明，下榻翠湖公園中省立昆華圖書館內。先生還代五華及雲大聘請李源澄、諸祖耿等先生來任教，不久也先後抵達。」<sup>67</sup> 錢穆再次入滇理由充足，思慮周全，非因某事而倉促逃避。錢穆雖然常年在外，但他對婚姻和家庭向懷負責與真誠之心。且不論輾轉四處時始終牽掛家裏，尋盡各種機會親近家人，將耦園中「家人相聚，老母弱子」的生活視為「生平最難獲得之兩年也」<sup>68</sup>。即便赴港辦學時仍不捨兒女，信告三子隨己就讀<sup>69</sup>。一九五一年秋，錢穆妻子張一貫突然腦中風，第一時間出診救治的，正是錢穆早先特意安排，託付幫助照料妻兒老小的須毓籌醫生<sup>70</sup>。可見，錢穆並非人們議論的那樣，只顧學問不顧家，他對妻母孩子十分關心和記掛。這樣的人又怎會做出「慮其夫人之追蹤」的事情來呢？至一九四八年，顧氏對錢穆「既驕且吝」、「薄情」的評價已十分嚴酷，是因同情一人苦撐撫育子女的張一貫而忿忿不平，還是嫌隙已久的突然爆發，抑或

<sup>66</sup> 錢穆：《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》，頁 241。

<sup>67</sup> 李埏：〈昔年從遊樂 今日終天痛——敬悼先師錢穆先生〉，《社會科學戰線》，1991 年第 4 期，頁 265。

<sup>68</sup> 錢穆：《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》，頁 223。

<sup>69</sup> 錢行：《思親補讀錄：走近父親錢穆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 年），頁 14。

<sup>70</sup> 周育華：《從無錫七房橋走出的文化大家——君子儒錢穆評傳》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11 年），頁 213。

是三人成虎造成了徹底的失望，這些我們已不得而知了。

一九四三年秋至一九四九年，錢穆先後執教過華西大學、四川大學、雲南大學、五華書院及江南大學等學校，期間筆耕不輟，完成多部經典著作：《清儒學案》（稿成，後為國立編譯館遺失）、《黃帝》（合著）、《政學私言》、《中國政治與文化》、《中國文化史導論》、《孟子研究》等<sup>71</sup>。此段時間顧頡剛則先後任課於復旦大學、蘇州社會教育學院、蘭州大學、誠明文學院、震旦大學等。在用心著述的同時，積極組織或任職於各種學術研究機構、出版單位及期刊社，如：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、大中國圖書公司、文通書局、中國史學會，並於一九四八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。此段時間二人學術造詣愈深，聲名愈盛，但生活均歷經坎坷漂泊不定。

## 五、天各一方，情誼永存

一九四九年，隨著內戰結束中國的知識階層發生直接而迅速的分化，一部分人留在大陸繼續學術事業，一部分人避走海外弘揚中華傳統文化。受個人性格思想及政治環境影響，顧頡剛與錢穆也最終走上了兩條不同的人生道路。錢穆在發出「不知共軍先後文告，亦有絲毫開國氣象否」的疑問，並得到錢基厚的默然回應後<sup>72</sup>，選擇了遠離發源蘇俄的馬列主義，隨私立華僑大學遷往香港，用自己的方式號召中華數千年文明的傳承。一九五〇年秋於香港創辦新亞書院，此後十餘年間常赴臺，做系列演講或講學。一九六〇年，又赴美國耶魯大學講學，獲耶魯大學頒贈名譽博士學位，後轉訪哈佛大學、哥倫比亞大學，再赴歐洲訪問。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，自香港遷居臺北市。次年，膺選「中央研究院」院士。此後，又受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、臺北故宮博物院等研究部門邀聘。錢穆的學術創造力並未因年歲日長而衰竭，反因生活的安穩幸福而煥發出新的生機。顧頡剛選擇了留在家鄉故土，卸去諸多社會職任，將自己的餘生奉獻給中國大陸的教育及歷史研究事業。一九五〇年被聘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，一九五二年任上海學院兼職教授，一九五

<sup>71</sup> 羅義俊：〈錢穆先生簡譜〉，《錢穆紀念文集》，頁 313-315。

<sup>72</sup> 錢穆：《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》，頁 261。

四年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，此後任職未再變更<sup>73</sup>。

兩人之間的情誼，曾使處於時代風暴中的顧頡剛不堪惴惴，更在環境的壓力下為後者投入「反動陣營」之事耿耿於懷。為脫身免責，顧頡剛不得不找出兩條二人殊途的理由：一是「(予)太愛才，見人寸長，恒欲其發展。如見錢賓四《先秦諸子繫年》，即為之介紹於燕大任講師，後又為介紹於北大、齊魯任教授，而彼狂妄自大之結果，反大詈予是也」<sup>74</sup>。一是「許多同學均說錢賓四『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為也』，說予則曰『摩頂放踵利天下，為之』，謂兩人性格彼時已看出不同來，所以今日有異，他已站到敵人隊伍裏去了」<sup>75</sup>。聽過由代理統戰部長徐冰做的關於李維漢、張執一反黨問題的報告後，顧頡剛更將提攜錢穆上升到「使彼有資本投入反動陣營，實為予對不起祖國之大事件」的「高度」<sup>76</sup>。事實上，顧頡剛與錢穆曾經的交誼，也確實讓前者於「文化大革命」中頗受連累：

1968年10月19日，九時半開始鬥爭，由文學所、歷史所兩同志狠狠地揭露了平伯與予之罪行。十一時畢。有人從南方來，詢予以黃淑蘭與錢穆關係，因寫一紙與之。

1968年12月12日，山東四人來，詢予以關則棟事，予不知。又詢牟潤孫、錢穆、郭紹虞、余元盒等事。<sup>77</sup>

無論如何，顧頡剛對錢穆的學識始終懷有敬重，更渴望通過閱讀錢氏文章而尋求精神慰藉和心靈契合。在五十年代的《顧頡剛日記》裏常有顧頡剛點讀錢穆著述的記載：

1953年11月25日，從《先秦諸子考辨》中集材，未畢。……賓四《先秦諸子繫年考辨》一書實甚精密，為不朽之作，雖有許多主觀之見，無害其為大醇。

1955年9月28日，到北海，點賓四《古本紀年輯校補正》，未畢。

1955年9月29日，點賓四《古本紀年輯校補正》訖。

1955年10月19日，看賓四著《三百年學術史》。

<sup>73</sup> 顧潮：《顧頡剛年譜》，頁353。

<sup>74</sup>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7卷，頁449，「1953年9月30日」。

<sup>75</sup> 同前註，頁729，「1955年8月23日」。

<sup>76</sup> 同前註，第10卷，頁196，「1965年1月10日」。

<sup>77</sup> 同前註，第11卷，頁39，「1968年10月19日」；頁55，「1968年12月12日」。

1958年7月14日，錢穆在香港重印其《諸子繫年》，頗有修改。今日辛田以食用不足，出所藏此書，欲予買之。而靜秋以其香港印，等於走私，堅令退回。<sup>78</sup>

顧頡剛也曾寫信給錢穆，希望他「能回來最好，即不回來亦望改善態度」<sup>79</sup>。錢穆晚年回憶說：「後余在香港，有人來言，頡剛面告，其在北平重獲舊時學業生涯。盼余能設法早歸。則其不忘情於余者，實始終如一。」<sup>80</sup>

顧頡剛逝世後，其女兒顧潮、顧洪為了出版《顧頡剛讀書筆記》，曾托人與錢穆聯繫，錢穆雖已年邁體衰，但仍然不遺餘力。顧潮回憶：「《讀書筆記》能在聯經公司順利出版，是離不開錢先生夫婦的大力幫助的，我們真是由衷地感謝他們。」<sup>81</sup>足見錢穆對顧頡剛亦深懷情誼。

顧頡剛與錢穆相交多年，他們有過間隙、有過誤解，但這並不妨礙彼此發自內心的激賞。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兩個具有鮮明學術個性和史學思想的學者，相知相惜，共同攙扶著走過戰火紛飛的年代；而一個百年的中截點又是他們人生際遇的轉折期，相望相憶，縱使心有萬語卻無再見之緣。他們以誨人不倦、著述不倦的一生，為中華史學的發展與文化的傳承竭盡全力；他們以投身學界、昌明國粹的事業，挺起了中華民族的脊梁。

<sup>78</sup> 同前註，第7卷，頁474，「1953年11月25日」；頁742，「1955年9月28日」；頁743，「1955年9月29日」；頁751，「1955年10月19日」。第8卷，頁460，「1958年7月14日」。

<sup>79</sup> 同前註，第8卷，頁238-239，「1957年5月2日」。

<sup>80</sup> 錢穆：《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》，頁231。

<sup>81</sup> 車行健，徐其寧：〈賢嗣傳家學，古史有餘音——顧潮教授訪談錄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第19卷第3期（2009年9月），頁122。

